

中国学校教育的演进

杨巨源

教育是按照一定的目的要求对社会中人从德、智、体诸方面施以影响的一种有计划的活动。它是一种社会现象,起源于劳动,适应传授生产劳动和社会经验的需要而产生,并随着社会的进步而不断发展进化。一定社会的教育是一定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和政治取向的反映,又反转来对生产力、生产关系、政治制度施以作用和影响。学校教育历来是教育活动的主要形式,也是教育社会化的必由之路。不管形势如何变化,它在社会生活和社会发展中总是扮演着其他教育形式无法替代的角色。

源远流长的古代学校教育

在自然界,多数较为高等的动物都懂得对下一代施以种种教育,在百般呵护的同时教给他们运动、筑巢、觅食、避敌和适应周围环境的本领,这是一种本能。动物对后代的教育是无意识的,人类对后代的教育是有意识的,这是人与动物教育的根本区别之所在。

在原始社会中,由于各方面条件的局限,人类对下一代的教育是在劳动和生活的实践中进行的。孩子生活在大人身边,亦步亦趋地学样,从而把生产和生活技能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从这一点上看,原始社会的教育既有动物教育后代的本能,又有社会化教育的稚嫩萌芽,可以视为动物教育向社会化教育进化的过渡阶段。

人类自觉的社会化教育始于奴隶社会，因为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专门的教育机构——学校。《礼记·学记》中说：“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州有序，国有学。”这里所说的塾、庠、序、学就是不同级别的学校。塾的原义是门内左右的房舍，周代二十五家为一闾，每闾一巷，巷首有门，门内建房设学，称为塾。居民朝夕出入，可随时入塾受教。后来的“家塾”、“私塾”皆本于此。每五百户为一党，党所设的学校称庠。庠与养同义，意谓凡人此学者皆可享受公费供养。序即射，是说让学生在此学习骑射技艺。州所设的学校称学，学即校，校与较同音，意即在此探讨学问，明辨是非。作为专指学校的“校”字后来转读为“孝”，只在“校对”、“校场”等含有比较意义的词语中才读如“较”。《孟子·滕文公》中说：“乡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在此后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庠序”遂成为乡学或学校的代称。

乡学是基层办的学校。周代，天子与诸侯也办学，但名称不同。周天子办的学校称“太学”，又叫“辟雍”。“太”有极高之义，故称。“辟雍”的原义是四面有水，环立如壁，用来称太学，含有与世隔断，凛然不可侵犯的意思。《大戴记·保傅》中说：“帝入太学，承师问道。”天子尚且到太学去求教，可见统治者对教育的重视。东汉时太学大发展，最多时太学生多达 3 万人。魏晋至明清，或设太学，或设国学、国子学、国子监，或二者同设，都是皇家传授儒家经典的最高学府。周代诸侯国也办学校。鲁国办的学校位于泮水之滨，故称“泮宫”。其他诸侯国争相效法，“泮宫”遂成为诸侯国共用的学校名称。不论天子诸侯办的学校还是乡学，其教程都分为小学和大学两个部分，小学以教授书、数为主，大学以教授礼、乐、射、御为主。大学和小学的学习内容加在一起，合称“六艺”。

对学政的管理，汉以前无专门官职，师为一校之长。汉代始设五经博士和博士祭酒，主掌学政。西晋改设国子祭酒、博士、助教，宋以后设提学、学政、教授、学正、教谕，清代增设学台，实际上是学

政的别称。应该指出的是,夏、商、周三代虽然国家和地方都设有学校,但以体力劳动为本业的平民即奴隶是没有接受学校教育的资格的。就连那些处于统治阶级最下层的士,如要学习,也只有以吏为师。“少也贱”的孔子以“好学不厌”的精神博通“六艺”创立儒家学派之后,提出了“有教无类”的主张,这种状况才有所改变。其高足颜回、原宪都是贫家子弟,仲弓是贱者之子,公冶长是刑释人员,子贡是商人。在孔子的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之中,出身贫寒者可能占有相当的比例。后来的秦始皇曾试图退回到以吏为师的制度中去,虽然最终未能实现,但在此后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有机会、有条件接受正规教育者仍多是官宦公子和富家子弟;处于社会最底层的穷人家的孩子求温饱尚属奢望,想受教育,也只能是望学兴叹了。我国的历史传说和传统戏曲中有许多“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一举成名的故事,察其真实身份,亦多是农村的中产阶层或家道一度中落的矢志之士,真正出身世代贫家者寥若晨星。小说和戏曲中贫家子弟一夜之间荣登金榜的故事,只不过是作者无奈的画饼充饥,人为地制造一个圆满结局。至于囊萤读书的车胤、